

「2015年度日韓伊兩岸・次世代フォーラム東アジアの文化とその交渉—新たな開拓に向けて」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報導

A Report on “The Japan-Korea-Italy-China-Taiwan Conference on the Next Generation Scholarship in Humanities Studies on Cultures and its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 Aiming at New Pioneering”

胡華喻^{*}、朱芯儀^{**}、林佑澤^{***}

Hu Hua-yu、Chu Hsin-i、Lin Yu-tse

日本關西大學於2015年11月27、28日邀集義大利羅馬大學、韓國嶺南大學、中國北京外國語大學與臺灣「近現代東亞文學與文化研究聯盟」之相關系所，¹假以文館四樓，召開以「東アジアの文化

* 作者現為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。

** 作者現為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。

*** 作者現為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。

¹ 臺灣「近現代東亞文學與文化研究聯盟」係由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、政治大學「歷史與思想數位人文實驗室」、政治大學「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

とその交渉——新たな開拓に向けて」爲主題之國際研討會，冀能藉此強化東亞區域的學術研究與跨國交流，並通過我者與他者之不同觀看方式，以發掘愈益深廣且具進一步探問意義之議題。研討會之進行，區別爲日本語、韓國語、中國語三類場次。

日本語場次，依研究徑路而論，約略得以分爲東亞思潮融匯、經典文本的改寫與翻譯、東亞文化物質展示、東亞地區民族相互想像四大面向。

東亞思潮融匯方面：北京外國語大學丛穎〈死者の身体と予言—『日本靈異記』における冥界訪問譚を中心に〉，以奈良時代的佛教敘事文學《日本國現報善惡靈異記》爲中心，聚焦於書中關於「造訪冥界而後生還」的故事。追求超越人間生死輪迴，爲佛教對日本文化的諸多影響之一，以「造訪冥界而後生還」的故事背景來說，則是主角透過將死而復生的預言，請求家人先不將屍體焚化，在歷經冥界種種之後，始頓悟人間一切皆虛妄，而於還陽後致力爲「生前」的種種缺失修行贖罪；在敘事表現方面，日本則多有結合中國「入冥」情節之處。中日「入冥」情節最大的共同點，乃皆以不破壞屍體爲前提；然相異之處，則在於中國「入冥」故事往往藉由生命徵候，表達死者精神仍然活動之不可思議；日本「入冥」故事則重在將死之人的懺悔，以主動要求保存屍體周全爲故事動力，在經歷生死視域切換之後，達到體悟佛教超脫生死的思想高度。《日本靈異記》的「入冥」情節經營，不僅結合中國化佛教及日本本有信仰，也對後世文學如《今昔物語集》、《扶桑略記》等有所啟發。關西大學任夢溪〈幕末明治における女子教育思想について—西村茂樹、福沢諭吉、森有礼の教育理念を中心に—〉，主要探討幕府末年至明治初期，社會上同時並存的三種女子教育觀。此三種女子教育觀之所以並行於明治初期的原因，與提倡者本身看待西方學術的態度相關。而女子教育之所以

史專業數據庫(1830-1930)」、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、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共組而成。

逐漸引起廣泛討論，乃因女性逐步被納入國力的評估範圍，女性的社會貢獻前景，混雜新世代政治轉型的期待，「女性教育」遂成爲東西思想優劣論戰的文化符號之一，在當時激起諸多討論。以儒教爲基礎而進行文化辯論的西村茂樹（1828-1902），認爲女子的順從與貞操，是鞏固民族文化不可或缺之一環。其並非放棄教育婦女，而是女子教育自古已有良好傳承及典範。西村認爲所謂教育，並非僅只適應潮流，不論男女，皆應將道德教育視爲教育最終目的。與西村相反的福澤諭吉（1835-1901），則大力推廣女性新式教育。福澤以男女平權爲出發點，認爲只要是女性的問題，其實亦可視作男性的問題。論者分析，福澤因早年接受蘭學，較能接受西方平權觀念，從而影響其對女性受教權的態度。森有禮（1847-1889）則融攝兩派立場，結合儒教及西方啟蒙思想，以女性作爲擔負「賢妻良母」責任的「國民」爲教育目標。然而，森有禮固然在融合東西教育觀上展現積極意義，但也因伴隨強烈的國家意識，形塑出日本獨有的女性教育觀。論者總結其研究，認爲以上三位教育者的教育理論，皆對儒教的當代意義有所回應，因此儒教在幕末明治時期，未必屬於較落後的思潮。

經典文本的改寫與翻譯方面：關西大學辜承堯〈青木正兒の中国新文化運動への眼差し—胡適との交際を手がかりに—〉，以分析青木正兒（1887-1964）與胡適（1891-1962）之間書信往來爲中心，探討兩人共同成就的學術研究成果。由於當時社會風氣，比起師承京都大學中國古典文學研究，青木更關注中國新文學發展動向，乃至於對中國新文化運動產生共鳴。1920年代開始，青木與胡適、陳獨秀（1879-1942）等人的接觸，除了在精神上支持胡適等人所展開的社會運動，也在學術研究上給予胡適等人刺激。尤其在《水滸傳》版本的考究，及《章實齋》年譜上，兩人除了互相幫忙蒐集文本外，也以往復書簡的方式進行討論。通過分析兩人書信內容，論者認爲胡適文學研究能有所成就，青木的學術意見實功不可沒。由此可見，晚清以降學術轉型，不光是內容上補充前朝成果，更是重新定位中國古典文

化；中國文學不再是中國獨有，而是國際學者共同參與研究的文化遺產，為世界共同關注。關西大學余雅婷〈『聖經直解』と『古新聖經』による聖書翻訳の繼承關係—4 福音書のマタイ編を中心に〉，則以兩本同為西方傳教士由拉丁文直譯為中文的《聖經》譯作為中心，探討《聖經直解》及《古新聖經》的先後繼承關係。《聖經直解》早於清朝開國（1636）便刊刻出版，《古新聖經》則遲至嘉慶五年（1800）方付梓印刷，然而兩本譯作的翻譯策略卻大不相同。《聖經直解》全書翻譯為文言文，《古新聖經》譯者賀清泰（1735-1813）則於〈序〉中明言，天主之所以不肯用絕美文辭闡釋自己的想法，是因為道理需為普羅大眾謹記，故必須淺顯易懂。此外，在宗教專有名詞及重要教義鋪敘手法上，兩書也明顯採取不同翻譯方式。論者認為，由於《聖經直解》相關出版物已極為少見，賀清泰是基於何種《聖經直解》的版本，而決心重譯《聖經》，需進一步研究，然自《聖經直解》至《古新聖經》的轉變可知，來華傳教士的傳教策略調整軌跡。而關西大學奧村ゼミ、張岑〈横山水滸伝のストーリー面で参照元について〉，主要是藉由分析橫山光輝（1934-2004）的漫畫《水滸傳》對白設計，發掘其賴以資藉的《水滸傳》譯本，以此考察現代日本對於《水滸傳》的接受狀況。眾所周知，《水滸傳》的日譯本相當豐富，自江戶時代開始不斷有譯本推陳出新。然比對橫山《水滸傳》對白可知，其於詩詞多仰賴松枝茂夫（1905-1995）譯本外，人物對話則幾乎受吉川英治（1892-1962）《新・水滸傳》的影響。進一步分析吉川《新・水滸傳》可知，與其認為此版本為省略本，不如說是以原版《水滸傳》為基礎的「創作」。橫山的漫畫《水滸傳》與吉川《新・水滸傳》的人物塑造及情節安排高度吻合，論者認為，橫山從小受到吉川英治編譯《三國志》、《水滸傳》等影響，在進行《水滸傳》漫畫創作時，多少受吉川故事敘述影響有關，而此亦可反映現代日本對於中國古典文學的接受樣態。

東亞文化物質展示方面：關西大學原田喜子〈大札記念国産振

與東京博覽會出品「民藝館」一室內造形における日本と朝鮮〉，聚焦於1928年「大禮紀念國產振興東京博覽會」之「民藝館」空間展演，主要企劃人柳宗悅（1889-1961）突破博覽會，藉由展示活動彰顯帝國主義的框架，展現出獨樹一幟的東亞美學意識。「民藝館」顧名思義，為如實呈現民俗工藝、民眾生活之展場，其最特出之處，為平凡的生活空間融入中國、朝鮮等傳統元素。例如主臥室雖然採日式擺設，卻與西式裝潢的接待室同樣使用朝鮮風格的屏風、座椅。「民藝館」的布置陳設，其實是具象化柳宗悅對未來生活樣貌的憧憬。柳宗悅固然以日本民族視界為起點，但卻能用心體察朝鮮、中國美學，尤其在家具的設計上，除展現各民族不同於日本的「日常」外，也藉「各國皆有的日常家具」表達人類的共通性。在帝國主義昌盛的二十世紀初，柳宗悅不僅藉由藝術陳設表達對於不同民族藝術的敬意之外，也將日本放入「多元世界」之中，試圖重新在殖民的緊張感之外，尋回日本真正的精神價值。關西大學索南卓瑪〈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女性尊と文化交渉〉，以東亞泛佛教女性神尊為中心，進行跨地域文化傳播之比較。論者承前人研究，分析佛教的女性角色形塑，大約於推崇「佛母」的密教興起之後，佛教女性神祇方能廣為信眾信仰。密教起源自印度，在傳播信仰的同時，也吸收了來自異國的文化元素。論者舉多羅菩薩、摩利支天、吉祥天女為例，隨著途經國家不同，女神外貌、性別、神譜地位也會有所改變。多羅菩薩在印度教信仰中原為觀音菩薩的配偶，傳至日本後，演變為觀音菩薩三十三種化身之一；摩利支天於印度教原本為男神，傳至中國、西藏後化為女神，後又因被日本武士視為保護神，因此又轉變為男神；吉祥天女在印度教中為愛神之母，在西藏密教中為首都拉薩的守護神，在中國佛教中，則被視為守護幸福的女神，且為四大天王之一毘沙門天之妻。論者認為，佛教中女性神像的不確定性，與地域文化及佛教的在地化息息相關，透過觀察佛像特色變化，亦可分析東亞佛教信仰的流行與傳播。

東亞地區民族相互想像方面：日本國際文化研究院簡中昊〈1940年代前期の台湾文学における「野蛮人」—眞杉静枝の「原住民もの」を例に一〉，探究自眞杉靜枝（1901-1955）的臺灣原住民族觀察、書寫，並非只有「國策文學」的面向，亦展現對於殖民地的關懷。在時代氛圍之下，作家維護帝國形象在所難免，但眞杉卻能活用以女性對家庭、人際關係的獨特感觸，重新建構社會寫實文學核心，尤其能突破日本男性作家「日本男性—原住民女性」的既定角色設定框架，發展更多維的「日本女性—日本男性—原住民女性」視角，讓霧社事件以來原住民族的定位，不再是單純的「野蠻」或「馴化」二分，而是立體化整個原住民族的生活樣貌。〈原住民もの〉固然背負著二戰時期的思潮包袱，但也表現出眞杉創作的獨特性。神戶大學劉靈均〈台灣「同志」(LGBT) 小説における「日本」像概説—1900年代を中心に一〉，則揭示長期遭主流研究所忽略、曲解的「同志文學」脈絡。1990年代同志文學研究的發展，雖不若1950年代幾遭世人以獵奇的眼光看待，但作品中所蘊含的政治語言及臺灣認同主體意義，卻仍未被突顯。論者認為，「同性戀愛」雖然是歐美譯介詞彙，然而臺灣同志作品對於角色描摹及情節設計，往往多受日本文化影響。本文藉由分析大量文本，例如朱天文《荒人手記》、朱天心《古都》、邱妙津（1969-1995）《鱷魚手記》、藍玉湖（1968-1991）《薔薇刑》、紀大偉《膜》、洪凌《宇宙奧迪賽》，甚至游素蘭《火王》、高永《星座刑事》等漫畫作品，拈出臺灣同志作品雖有白先勇《孽子》等為先例，但由近年同志文學創作取向可知，臺灣仍受日本文化相當強烈的影響。透過分析臺灣同志文學中的日本形象，正可反推臺灣其實是透過日本來認識同志群體與同志文化。

韓國語場次，討論年代涵蓋近代至當代的日本、朝鮮與韓國，而研究範圍卻不滯足於文學、文本詮釋，更涉及電影影像，此外仍有語言、文化交流、近代都市風貌的轉變與人口遷移，以多元的視角，探討從近代以來東亞各國文化發展的碰撞與交融，約略得以分為殖民地

文學、他者視域、文化比較、語言與文化互動四大面向。

殖民地文學方面：嶺南大學孔主恩〈內鮮戀愛小說的興衰整研究——以李孝石的內鮮戀愛小說爲中心（내선연애 소설에 나타난 내선일체 붕괴 과 연구——이효석의 내선연애 소설을 중심으로〔內鮮戀愛小說に現れた內鮮一体崩壞過程の研究—李孝石の內鮮戀愛小說を中心に—〕〉〉，乃以文學爲核心，關注1937年日俄戰爭前，日本早於甲午戰爭至二戰期間實行「東亞新體制」來刺激建設，並對朝鮮實施「內鮮一體」（日鮮一體），以吸納更多殖民地，進行大東亞計畫，產生的文學類型「戀愛小說」，以刺激婚戀體制。第八任朝鮮總督南次郎（1874-1955），爲在朝鮮取得更多所需戰力與融合，積極進行日朝通婚，鼓勵朝鮮男子與日本女子聯姻，而這些現象反映在當時作家的作品中。該篇論文關注朝鮮作家李孝石（이효석，1907-1942）的「內朝戀愛小說」，如〈綠色塔〉、〈薊章〉。論者通過研究李孝石的戀愛小說，探討殖民暴力、愛情與敘事間闡發的效力，從日本的延伸擴展、召喚戰爭群體的目的而宣導整體團結，到文本轉化爲愛情的真正延伸，內朝戀愛小說典範經過興衰的推移。而李孝石創作浪漫敘事，藉由〈綠色塔〉、〈薊章〉文本中所凸顯的矛盾與敘述的衰變過程，是爲相當重要、有趣的研究。

他者視域方面：嶺南大學정호윤〈明清時期朝鮮漂流民觀看中國——以崔溥、崔斗燦爲中心（明, 清시기 中國인이 바라본 朝鮮漂流民—최부〔崔溥〕, 최두찬〔崔斗燦〕을 중심으로—〉〉，論述朝鮮時代的東亞細亞是多個國家共存的時期，這時期藉由海上船運進行各國之間的文化交流，所以「漂流」成爲記錄中國社會歷史、文學、文化的唯一方式。藉由觀察朝鮮漂流民作品的研究，可窺得雙方的文化關係、社會制度與文學性，以崔溥（최부，1454-1504）〈漂海錄〉、崔斗燦（최두찬，1779-?）〈乘樣錄〉進行研究。明代崔溥〈漂海錄〉便曾記載出至中國，民眾對說著不同語言外國人的到來感到好奇，並顯示兩國民眾互相膚淺的了解。至清代崔斗燦，則在1818年四月至

十月間來訪中國浙江省寧波（寧波府），記錄18世紀雙方頻繁互動和旅行，外國訪客的增加，促進文士之間唱酬，激發詩文交流。藉由兩者的案例，可以觀察從明至清中國與朝鮮交流的狀況，從疏於交流、對朝鮮未有了解，到中國開始關注朝鮮地理與歷史，造成雙方知識分子的往來。

文化比較方面：嶺南大學鄭男熙：〈韓國安東和中國湖南地域書院的近代化對應比較研究（韓國 安東과 中國 湖南 地域 書院의 近代化 對應樣相 比較研究）〉，首先梳理「東亞細亞」是近代所產之用語，而東亞細亞的共同要素乃是漢字和儒教。論者立基兩者共同的書院文化，並聚焦於相異的地區：「安東」和「湖南」，挖掘其中地域差異而導致書院文化的變容。發現由湖南到安東區域，書院文化的傳遞雖有相同的部分，如程朱理學、王權強化等概念，但亦經由在地化後而有所改變。文中除耙梳宋代至明代的理學歷史外，並梳理朝鮮高宗時期朋黨政治下是如何接受書院文化進入朝鮮。提及該波潮流著名人物：批判陽明心學的柳健休（유건휴，1786-1837）《異學集辯》；安東地區革新儒學的李湘龍（1858-1932）、柳寅植（류인식，1865-1928）等。晚清安東地區的現代化教育開始逐漸啟蒙，特別受到梁啟超（1873-1929）影響最深。最後得出，湖南的書院文化較為靈活，採用經世致用之法，以書院為改革之發源；相較於安東地區，則較為保守，保持對近代化「衛正斥邪」的心態；另外韓國書院的徹底獨立私學化與中國官學化亦有極大的差異。關西大學姜丙順〈韓、日現代化的社區祭典——大阪狹山市狹山池祭和金堤市地平線祝祭為主（한·일〔韓日〕 현대 도시축제를 통해 살펴본 지역사회—오사카 사야마시〔大阪狹山市〕 사야마이케마즈리〔狹山池り〕와 김제시〔金堤市〕 지평선축제〔地平線祝祭〕를 중심으로—〉〉，則比較近代化日韓都市祭典之發展，以大阪狹山市狹山池祭與金堤市地平線祝祭為研究主題，分別介紹大阪狹山池祭由地區的商業街中心所主辦，代表著當地居民的文化連結與信仰象徵，同時也為日本的文化資產。由

此，本文將同樣為韓國歷史古蹟的碧骨堤，即金堤地平線祝祭做出對比。狹山池是日本最古老的水壩式蓄水池，並歷經奈良、鎌倉、江戶時代。狹山池祭在每年四月或五月舉行，並建立狹山池公園和狹山池博物館。這裡所有出土文物成為狹山池博物館重要文物，該水庫亦在2015年被指定為國家歷史遺址。而韓國金堤市的地平線祝祭，則在1999年開始，每年的十月舉辦，「碧骨堤」為慶典的主場地，乃新羅時代最古老的水利設施，列名世界文化遺產。從兩個案例中，提出狹山市狹山池祭的成形，來自透過國家文化遺產的建立與當地居民產生連結。金堤市地平線祝祭則非是國家為前提，反是以地區、社區經濟為其主要發展的因素。

語言與文化互動方面：嶺南大學朴信明〈補助詞—「ㄱ/ㅇ」的特徵及演化—以安南地區文學為主（보조사 '- ㄱ/ㅇ' 의 특성과 그 전개—영남 지역 문헌을 중심으로—〔補助詞—ゴッ/オッの特性とその展開—嶺南地域の文脈を中心に〕〉〉，分別觀察語言與文化之關聯，聚焦於補助詞「ㄱ/ㅇ」在嶺南地區的用法，仔細蒐集與歸納嶺南地區文獻中的呈現，以歸結「ㄱ/ㅇ」的演變。可歸納出下列之形態和語法屬性，如「- ㄱ」主要包括「強調」，以表示「單獨」的含義，也意為「限定」；或於十六世紀到二十世紀的文獻，發現「- ㄱ」在十七世紀仍出現，但在十八世紀的嶺南便已經消失等現象。經由統攝地區上補助詞的用法，探究人、語言甚至文化的互動，依存於語言文字上的寄居。關西大學平山和輝〈大阪府大阪市生野區旅日韓國人的語言相關性（以御幸森商店街為例）（오사카부 오사카시 이쿠노 구에 있어서의 제일 한국인의 언어상에 대한 글류〔미유키 모리 상가를 사례로〕〔大阪府大阪市生野区における在日韓国・朝鮮人の言語相についての文類（御幸森商店街を事例に）〕〉〉，則由於1910年至1945年，戰後出現一批定居日本的在日朝鮮人，致使大阪府大阪市生野區成為日本最大的韓國人聚集區之一。在日朝鮮人經時間變遷，母語的使用下降，加以婚姻、工作與生活皆在日本，導致後

裔母語能力連帶下降。經歷政權的更迭和政策、環境等方面的語言教育變化，語言明顯地表現差異。可藉朝鮮在日本的御幸森商業市場，觀察其每一代語言的時刻變化，該文對商業用語字元和單詞進行調查和分析。以招牌作出詳細統計，包含漢字兼韓語招牌、韓語兼片假名招牌、日語招牌，得出韓語兼日語招牌自2002年至2015年數量漸增，漢字招牌則相繼減少等情況，從文字使用之方法，推演文化在語言表現的流轉。此外，嶺南大學김태환〈韓國電影所顯現的移民女性韓語教育——以電影「格鬥少年菀得(완득이)」爲例(綱국 영화를 통한 이주여성 한국어 교육—영화 완득이를 이용하여—[韓國映画を通じた移住女性韓国語教育—映画ワンドウギを利用して—])〉，通過電影影像的思考，將領域擴展至全球人口移動，而關懷多元文化交流的困境與開展，乃以2011年上映由劉亞仁、金允石主演的電影「格鬥少年菀得(완득이)」爲對象，改編自2008年出版、김려령著之同名小說。該電影藉由主人翁菀得—出生單親、貧困的家庭，父親殘障與菲律賓人母親的邊緣高中生故事。論者注意國際化、資金流動的現代社會，接連產生的人口轉移的移民樣態，而韓國亦在這樣的世界潮流中，產生多元文化的碰撞與移民婦女的問題。如同電影之故事架構，在韓國真實國際通婚案例，據司法部移民政策中心的統計一年高達30000件，並穩定成長，這也增加了已婚婦女的移民所佔的比例。不僅僅在韓國，全世界的人口移動，背後暗示著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、爭奪與融合，乃至於移民後之經濟虛弱與適應困難。同時，也關懷移民女性受韓語教育的狀況，這是融入韓國社會的重要條件之一，對此韓國司法部與性別平等與家庭事務部已進行包含一對一訪視、教育系統輔助與學習網站，以助語言融合。再者，則利用電影傳播的優勢，進行電影韓語培育，配合聽、說、讀、寫四個步驟，電影成爲良好的韓語教學腳本；論者亦詳細比較電影與原著小說的差異、電影與韓語學習的方法等。

中國語場次，約略可以區分爲研究貢獻、語詞文法、歷史現象、

社會文化、文學譯介、思想觀念六大面向，自整理中外文史材料而擊析文化之傳播與互動現象，有助於增進關於東亞區域之多元思考，惟無由否認亦得見論述層次不足之弊病。

研究貢獻方面：側重對前人研究概況之介紹。羅馬大學 Orlandi Giorgio（羅巍）〈歐美學者對「上古音」研究的貢獻〉，意欲彰顯十九世紀以降馬歇曼（1768-1837）、福羅秘車里（1856-1936）、沙畹（1865-1918）、高本漢（1889-1978）等歐美學者關於上古音研究之成就，而與歷代中國學者之觀察大相逕庭。北京外國語大學張西豔〈小川琢治的《山海經》研究〉，則彙整小川琢治（1870-1941）關於《山海經》篇目、版本、錯簡與訛字、性質與價值、神話之考察成果，從而強調其治學態度、方法帶給中、日學者極大之影響。惟張文未進一步闡述小川琢治之學術視野如何形成，且對中、日學者之影響亦欠缺說明。

語詞文法方面：聚焦於清代官話系統，觀察日本、琉球有關中國官話教材之語法現象。關西大學齊燦〈《北京官話全編》方所時間介詞及對象介詞研究——以前一百章為例〉，對深澤暹（1876-1944）《北京官話全編》之方所時間介詞、對象介詞進行初步考察，並參照明治時期北京官話課本與《官話指南》，認為普遍使用之「在、到、從、打、趕、等」六個方所時間介詞與「給、和、比」三個對象介詞，分工已益趨明確，然部分介詞之功能與同時期日本北京官話教材存有細微差別。北京外國語大學蔡航〈清代琉球官話教材指示代詞和疑問代詞淺析——以《百姓官話》為例〉，則選取不同時期口語色彩較強之古本《老乞大》、《老乞大諺解》、《紅樓夢》前八十回、《兒女英雄傳》以與《百姓官話》進行對比分析，發現《百姓官話》關於指示代詞、疑問代詞之使用已較前期文獻成熟，然較諸同期文獻卻趨於基礎、簡化，且未吸收方言特色濃厚之詞彙。二文指陳北京官話教材於日本、琉球皆與中國官話現象存有差異，而未進一步探究差異何以形成，是為各自語言系統所影響？抑或是中國官方與民間之語法不同

導致？藉此當得以深入了解語法傳播發生變遷之意義。

歷史現象方面：主要是觀察一特定時期之中外關係。北京外國語大學張宜婷〈唐代長安蕃族研究——以長安城內蕃族賜宅問題為例〉，說明長安受賜蕃族與居處概況，並指陳唐代蕃族居處空間之配置變化，顯示朝廷態度具獎勵內附而助長融合，乃至於有效監控之演進脈絡。由於張文涉及帝都空間之方位佈局，是以除政治目的外，安排設計當有其思維模式，如唐太宗時期何以置諸蕃族於街坊；唐玄宗時期何以置朝鮮族於東北方？信將有助於深入抉發唐代對中外關係之理解。而嶺南大學孫慧楠〈關於唐朝時期在唐新羅人概況研究〉，聚焦於唐代新羅人移居中國之交通管道與匯集區域，表示官方、民間皆與新羅人有廣泛交流。嶺南大學王忠誠〈元代貢女的認知與了解〉，則指陳元代官方、民間皆對高麗女有廣泛之需求，且帶給元代政治、社會、文化深遠之影響。惟孫文與王文尚未進一步闡述新羅、高麗對唐代、元代造成影響之具體情況。此外，羅馬大學 Renata Vinci〈三門灣事件時期《申報》文章中對義大利的公眾情緒〉，就《申報》有關三門灣事件之報導與中國對義大利之觀感，以闡述此一觀感具有驚恐與笑噓之態度變化，論及促成觀感型態之原因。關西大學王君強〈20世紀初期「間島問題」始末的再考察——以內藤湖南的調查文獻為中心〉，乃自內藤湖南（1866-1934）對中、韓間島爭議之調查切入，得見內藤湖南為日本官方背書之意向，由是觀察中、日關於間島之交涉，乃為取得極大利益而互有讓步之情形。

社會文化方面：關注於中、韓之比較與交流。嶺南大學王寧〈中、韓歲時風俗的比較研究——以中秋節（秋夕）為中心〉，比較中、韓中秋節活動之差異，並說明「月」之象徵於中、韓分別有「團聚」與「女性」、「多產」之意味。然中、韓之中秋文化何以同、何以異？其形成與交流之情況如何？皆是得以深入耙梳之關鍵面向。嶺南大學葛倩〈韓國電視劇在中國大陸的傳播及影響〉，則是觀察近二十年中國引進韓劇數量大幅增長之現象，從而說明電視劇所見之書籍、

通訊軟體皆因之備受關注，乃至於活絡旅遊、廣告、餐飲之消費市場。除此之外，亦得並置、參照中國大陸引進日本電視劇之傳播、影響狀況，藉以探究韓劇能蔚為風潮之多方因素，尤其近年甚至向韓國實境節目組購買製作、播放版權，足見韓國社會文化之強勢輸入，且文化輸出之意圖極為明顯，由是所導致之影響十分值得深入擘析以為借鏡。

文學譯介方面：著重對遙譯現象之探討，藉此闡述文學之傳播、接受、變異、影響，從而反映不同時空語境、文化脈絡之回應。臺灣清華大學朱芯儀〈給下一輪戰爭亂世的備忘錄——從《英德未來戰爭記》到《中國戰爭未來記》〉，即以「戰爭未來記」此類預言小說為核心，比較《英德未來戰爭記》與《空中戰爭未來記》於原著、日譯、中譯之異同，因之抉發譯本接受與變異之緣由，如日譯《英德未來戰爭記》展現出文明開化先驅者之姿態，由是合理化軍事擴張之野心；中譯雖源自日譯，然卻意欲彰顯各式改革與辦報啟蒙之重要，遂進一步以《中國戰爭未來記》擘析遙譯影響下之自我轉化情況。政治大學羅珮瑄〈晚清留日學生語境中的《孽海花》〉，則留意政治小說《孽海花》遊走於歷史與傳聞間之複雜建構，強調傳聞所反顯之留日學生語境，同時，亦反映出中國疆域自中心淪為世界組成單位之觀點，以及藉白話、譯語、方言之運用，透露有權勢、列強、庶民之互動關係。惟仍有進一步之論述空間，乃至於擘析留日學生語境之殊異表現。而臺灣大學魏亦均〈東亞「翻譯政治」下的知識流動：臺灣日治時期翻譯文學的自覺與自決——以〈小人島誌〉、〈小人國記〉為討論對象〉是以〈小人島誌〉與〈小人國記〉考察臺灣文學現代性之發生，指陳〈小人島誌〉反映出重構混聲之語／文型態，二十年後之〈小人國記〉則於新舊文學論戰語境下，生成以中國／白話文為主之典律。臺灣清華大學趙家琦〈1930年代「無意義」(Nonsense)文學的日、中行旅：從昭和摩登到上海新感覺派〉，乃自「昭和摩登」與「上海摩登」之文化／學，以觀察「無意義」進入現代東亞語境後所引發「無／有

意義」之在地回應與應用變化。北京外國語大學杜慶龍〈諾獎前莫言作品在日韓的譯介及影響〉，申明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前，即已於日、韓造成廣泛迴響，並發掘有影視媒體、翻譯出版、訪問交流、亞洲文化等原因，然其於文化之實質影響則尚待進一步探討。

思想觀念方面：集中考察經典流播與思維現象之情況。政治大學林佑澤〈中國關於「東海」空間之書寫觀察〉，擊析中國歷代對「東海」一詞之使用，以為隋代前之人世有道德而奇異之書寫傾向，唐、宋時期則展現出側重體驗與反思之理性化近程，降至元、明、清時期，顯示東海已逐漸納入世界之視域，於此脈絡得見中心、邊緣自二元對立而消弭邊界之變遷，同時，亦存有傳統同心圓思維之解構與重構現象。惟若能與日、韓之書寫相互參照，信將有助於通過不同之觀看方式以深入理解彼此之思維觀念。政治大學胡華喻〈論貝原益軒「心主忠信」架構下的聖學觀——以《大疑錄》為考察範圍〉，則就《大疑錄》探討貝原益軒（1630-1714）對宋儒說法之思索，從而經由親身實踐紹承聖人道統，乃至於強調「學文」以貫通儒學，於是逐步建構其「心主忠信」之聖學觀。關西大學李楊〈荻生徂徠在《論語微》中對「君子」概念的演繹——以「君子不重則不威」章與「君子食無求飽」章為中心〉，是陳述荻生徂徠（1666-1728）對「君子」之解讀。而胡文與李文皆提及日本對「忠信」觀念之接受，或得深入探查「忠信」於東亞之接受與變異情況。此外，政治大學邱偉雲、鄭文惠〈從「國民」到「新國民」：中國近代國民觀念的形成與演變研究〉，觀察中國近代關於「新的崇拜」現象，由「新國民」切入，得見清季於立憲與革命之改良與革新差異，民初之中國強調與舊傳統相對之新文化運動，臺灣地區則與日本之同化政策有關，誠為東亞新、舊思維之斷裂提供探尋方向。而臺灣大學鍾秩維〈衍生的中國——臺灣人的詮釋共同體與華語語系觀點〉，是對中國／臺灣地區之模糊邊緣進行思考，是以嘗試藉由「衍生的中國」此一論點，通過文化／詮釋共同體呈顯同文／差異，因以回應史書美之華語語系觀點。

綜觀日本語、韓國語、中國語場次之研究成果，得見考察東亞文化交流現象之媒材，並不限於文學與歷史層面，亦含括物質美學與靜態展示、留學與移民之社會適應、影視媒體之傳播、思維變遷與文化激盪等層面。是知推展東亞文化論述，不僅是為探尋普遍意義之哲學觀念，亦得以進一步理解現代東亞生活樣貌之形塑過程。尤其此次國際研討會藉由我者與他者視角之多重轉換，於模糊疆界下不斷豐厚「東亞」的概念與層次，深廣化彼此對於東亞之認識與詮釋，重新回顧過去以立足當代，從而放眼未來的嶄新契機，值得持續關注與經營。